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学术透视 ——从20世纪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两种路径的争论谈起

张明

摘要 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保守主义解读模式,寄希望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排他性真理、在阅读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幻象、研究者固守中国学研究范式而导致的理论视域“矮化”,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新左翼学者的激烈批判。以德里克·哈里和奈特为代表的新左翼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出发,从毛泽东的思想的多元面相和复杂历史遗产出发,并且致力于突破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限制、引入症候阅读等解释学方法来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这些研究路径的开拓,构成了新左翼学者批判性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重要维度,也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突破传统研究路径限制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论探索。但这种理论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应以辩证的、全面的科学态度对其加以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 海外毛泽东学;中国学;马克思主义;新左翼学者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3-0021-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8JHQ020)

透视、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是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在海外毛泽东学7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①,毛泽东思想肖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者笔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复杂面相。尽管在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性历史中,毛泽东思想肖像呈现出多元的变动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元变动中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部一致性,即由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基于特定理论范式^②构筑起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整体性轮廓。在这个基本轮廓下,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理论的出发点或兴趣点对轮廓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充实和补充。然而,在由主流研究范式构成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学术共同体”之外,还存在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另类解读模式,即20世纪70年代以佩弗(Pfeffer)、沃尔德(Andrew Walder)为代表的,和90年代发展到高峰时以德里克(Arif Dirlik)、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等新左翼

①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化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其标志是1951年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Schwartz I. Benjamin)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P152)一书。史华慈书中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异端”。史华慈的上述研究倾向上实际上延续了其导师费正清的相关观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学者,基于对中国革命同情的心理,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与苏联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区别。这一基本态度后来成为哈佛费正清学派的理论基调,深刻影响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走向。当然,史华慈关于“毛主义”是“异端”的理论判断也遭到了来自保守派的理论批评,如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指出,所谓“毛主义”概念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传说”(Legend of Maoism),因为中国革命在本质上就是苏联的“远东阴谋”而已^[2](P72-86)。史华慈与魏特夫关于“毛主义”是否是“传说”的争论,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著名的“第一次大论战”。

② 所谓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主要是指遵循由哈佛学派代表人物费正清开启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基本范式的学者,其相关研究经历了史华慈的学术性奠基、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资料性补白和沃马克(Brantly Woamck)等新生代学者的创造性解读等不同发展阶段。

学者为代表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批判性透视”(critical perspectives)^①。这里所言的“批判性”,并非指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批判,而主要是对当时在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在新左翼学者看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所谓主流研究范式其实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一种保守主义解读模式,而新左翼开启的所谓批判性学术透视正是针对保守学术研究的弊病而作,是从批判性左翼(critical left)视角切入而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reevaluation of Mao)^[3](P11)。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这两种思潮之间的争锋与较量出发,通过对新左翼批判性透视历史语境的揭示,以期在此基础上大致勾画出新左翼批判性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基本理论结构,并期冀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性空间。

一、海外新左翼学者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历史语境

海外新左翼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批判性透视,并非基于纯粹个体理论兴趣的尝试性探索,而是深刻地根植于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保守主义”解读范式居于统治地位及其形成的压抑性、封闭性的学术氛围之中,是直接针对这种保守主义学术研究范式而生发的某种“理论突围”。因此,探讨新左翼批判性透视思潮的具体历史语境,倘若离开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保守主义研究氛围,则无从将此问题从根本上加以厘清。毛泽东研究在海外作为一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最初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关于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奠基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成立专门研究中心,使海外毛泽东研究相对摆脱单纯区域研究的限定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且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门学术人才^[4](P1-32);到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正式提出“毛主义”概念,进而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开端”(the first scholarly account of Mao)^[5](P17);再到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经典文献资料的系统化收集和整理工作所发挥的资料性补白作用^②,以及建立在上述原始资料基础上的理论解读工作;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以沃马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传统延续与理论创新^③。可以说,上述理论谱系的延续发展,构成了海外主流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范式。进一步而言,上述主流学者及其研究范式的内部共同性,在一定程度上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学术共同体”。因为他们的研究延续了共同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并且为毛泽东勾画了一幅整体上大致相同的思想肖像。

因此,在居于学术主导地位的主流研究者那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主要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一是寄希望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排他性唯一真理,并且这种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和解释主要是掌握在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手中;二是在关于毛泽东的解读过程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占据了主流统治地位,认为只需占有毛泽东的全部文本便可直接无损地展现所谓毛泽东真实全面的思想肖像;三是基于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历史性定位,从中国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中透视毛泽东,从而摒弃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其他理论资源介入的可能性;四是致力于将毛泽东刻画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形塑,甚至在很

① 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海外第一代“左翼学者”与90年代第二代新左翼学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第一代学者更多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都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较为深厚的掌握;而第二代学者尽管在理论立场上倾向于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其本身并非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身份上并不一定认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定位。二是第一代学者的理论支援背景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毛泽东及其思想;而第二代学者的理论资源相对更为多元丰富,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都常见于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分析和思考之中。例如,第二代学者中的德里克·奈特等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范式有着较为熟悉的掌握。

② 其中最突出的贡献便是施拉姆领导的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即《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的文献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该套丛书是目前英语世界研究毛泽东的最完整的著作,预计总共出版10卷,目前已经出版8卷。最新一卷是由施拉姆任主编,齐慕实任副主编,时间跨度为1942年至1945年,即从“延安整风”到《论联合政府》。

③ 施拉姆在对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一篇关于毛泽东逝世后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概况及其评论的文章中,对沃马克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提出的“有机解读法”(in vivo interpretation)表示了肯定和赞扬^[6](P21-22)。

大程度上带有浓厚唯意志论色彩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上述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及其理论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范式并居于学术的统治地位。这种研究在新左翼学者看来，直接封闭了毛泽东研究深化和拓展的可能性空间，并且造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长期存在的“理论贫困”(theoretical aridity)状态。正是针对主流保守主义解读模式的统治地位及其造成的理论消极效应，新左翼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主流研究范式展开了集中的理论批判。这种批判性左翼思潮的介入，从根本上而言是特定历史语境相互交融的历史性产物。

第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固化”与“毛泽东热”之间的冲突及其间的张力关系，为新左翼思潮的批判性介入提供了重要支援背景。毛泽东逝世之后，尤其是伴随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尤其是他晚年的理论实践作出了科学评价，之后国内的毛泽东相关研究主要都围绕“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精神和基本原则展开。虽然以“三七开”的评价方式肯定了毛泽东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存在的定位，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为回应左翼学者批评和进行自我辩护的“护身符”。这要从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1976年爆发于《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上的“第二次论战”(Modern China debate)开始谈起^[7](P81)。此次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佩弗和沃尔德为代表的“左派”和以史华慈、施拉姆等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①。“左派”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自由派”对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解存在从方法到内容的双重缺陷，即从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存在机械论的漫画式图解，忽略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从内容上极力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动态发展的谱系中定位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更倾向于将毛泽东理解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烙印的“唯意志论者”^[7](P102)。针对“左派”的批评意见，“自由派”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而是对此表示了鄙夷和嘲讽，将相关批评意见抛之脑后并继续按照其固有的模式展开研究。以施拉姆为例，针对“左派”学者从内容和方法上提出的批判性意见，他仍继续坚持毛泽东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固化结论，并且“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公布反而引起了施拉姆本人极大的欢呼。因为在他看来，“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晚年毛泽东理论实践的否定性评价恰恰证明了他固守的毛泽东的思想“异端论”和“唯意志论”的“科学性”。尽管20世纪70年代“左派”学者对保守主义理解模式的挑战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和回应——主要原因在于保守主义学派占据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术地位，并且具有学术的裁定权(裁定国外研究可阅读文献的范围、裁定研究文献的有效性或真实性)^[3](P9)，但在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开始突出的一批新左翼学者看来，毛泽东及其形象在当代中国将会实现周期性“回潮”现象，毛泽东在当代中国业已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或象征性存在，这代表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期冀或愿景意识。“毛泽东复兴”(Mao revival)从根本上而言表达了一种及时的提醒，即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复杂性和毛泽东多元面相存在的可能性。关于对毛泽东的理解和透视不可能仅拘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规定的“宜粗不宜细”的框架中就可以达成。尽管新左翼学者承认“第二个历史决议”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但是他们拒绝固守在“第二个历史决议”构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作为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框架之中透视毛泽东，而更加倾向于使用“毛泽东的思想”(Mao's thought)以期为“批判的左

① 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发展的初期，主要存在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和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争论。前者持毛泽东的思想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异端”的“毛主义”论，后者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坚持认为所谓“毛主义”不过是“传说”，这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爆发于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一次论战”。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分裂，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派”关于“毛主义”是“异端”的论断，因而“保守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自由派”的影响不断增大。然而，也正是随着中苏关系的分裂、越南战争以及中国“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从中分离出了一批“左派”学者，诸如佩弗和沃尔德^[7](P81)。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左派”学者主要是由那些不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欲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中青年学者构成，他们并不一定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都寄希望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寻求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8](P20)。因此，这里所言的“左”更多的是从一种政治态度和理论姿态上而言的，即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并且期冀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求某种抗议与批判的话语与中介。

翼介入”(critical left interventions)构筑一个开放性空间^[31](P5)。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跌宕强化了理解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趋向。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左派运动也面临着寿终正寝的局面。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步入退守和消极阶段,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似乎一夜间全部转移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控之中。在后冷战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进行了系列探索性实践,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差异性空间,被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解释为社会主义的“异轨”。上述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透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西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幻象,即从原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偏移到从民族主义等维度透视当代中国,形成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极化趋势以及在西方保守势力看来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变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直接强化了保守主义模式对毛泽东的理解,即认为毛泽东更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唯意志论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对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式的操持、运用其实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较之于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以及重新肯定中国已逝的荣耀”^[31](P11)。也就是说,在保守主义学派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以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所谓转型,以回溯的方式证明了其学派内部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之正确性,即从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来理解毛泽东、透视中国革命,从“异端”的维度定位毛泽东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否认毛泽东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定位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唯意志论色彩等角度把握毛泽东思想肖像。

第三,历史新变化和新材料的出现,呼唤新左翼思潮对毛泽东的重新阅读。这里所言的历史新变化,既有上述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亦有来自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历史性变化。就西方国家而言,后冷战时代的开启及其催生的西方战略目标的东移——瓦解社会主义中国,从直接意义上契合了保守主义理解模式。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后,社会主义中国便自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对象,因而保守主义关于毛泽东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唯意志论理解,自然契合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利益诉求。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保守主义理解模式从其开始确立的所谓“自由客观”的研究立场,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却成为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共谋”,对毛泽东的保守主义理解恰恰迎合了后冷战时期西方针对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需要。就当代中国的历史变化而言,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西方部分学者看来正愈发凸显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色彩”。因为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时代重归经济建设以及对主观意志能动作用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纠偏。在国内历史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大量关于毛泽东的新材料不断被披露,当然这主要是中国官方大批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文献,如《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年谱》等。这些新材料的出现极大扩充了毛泽东研究的文献群,改变了毛泽东研究文本的存在状态。这些新文本的出现以及“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研究界限作出的清晰界划,极大地鼓励了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同样,上述新材料的出现也为左翼学者的批判性介入提供了中介。因为在许多左翼学者看来,上述全新文本的公布“不仅极大扩展了构成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基础的毛泽东文本的理论空间,而且也急剧改变了传统研究领域的面貌,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传统阐释受到了质疑、早先的一些研究争论也需要进一步思考”^[9](P1)。换言之,这些新文本在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严峻挑战,因为每个全新文本都意味着一个未被探知的“知识领域”,存在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性。当然,这种挑战不仅是针对左翼学者的批判性解读提出的,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体现在上述新材料的出现上,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反过来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所用,并且用以巩固其关于毛泽东的保守主义理解^[31](P13)。正是历史新变化和新材料的出现对毛泽东研究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双重影响,才提出了呼唤新左翼学者批判性介入毛泽东研究之中的历史任务。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定位毛泽东的批判性透视

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从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正式学术研究领域确立的“毛主义”概念之提出,还是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理论透视,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回避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前两次论战都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起。保守主义理解模式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的可能性,否认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定位问题。经过一代又一代自由派学者的继承和发展——以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为载体,关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异端”和“唯意志论者”的基本判断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主流派别的学术传统而被不断传承,新左翼学者对上述摒弃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谱系之间关系来透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保守主义研究模式,表达了激烈的反对和批评。

第一,保守主义学者“中国学”研究的出身限制了其理论视野,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匮乏和研究中的“去马克思主义化”倾向。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学”(China Study)研究之中,大部分第一代学者都是研究中国学的,只不过随着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重要性的凸显,以及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非替代性影响,才逐步使海外毛泽东研究开始从“中国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及其最终胜利,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海外学者那里构成了中国研究的重要“代名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分离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而言的,因为海外毛泽东研究始终与中国学研究保持着紧密的关联,二者基本上分有相同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许多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仍然跨界于上述两大领域从事交叉研究。例如,史华慈在费正清的指导下完成《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博士论文后,转向了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国学研究的出身必然会导致一种固化的思维定式,即毛泽东首先是一位中国人,要想了解毛泽东则必须要首先了解中国,对毛泽东的理解和透视只能借助中国研究(理解中国语言、历史、文化、政治和哲学传统)这个中介才能谈及。这是中国学研究的固定思路,并且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即否认任何其他学科或者理论介入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因为在保守主义学者看来,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中国学的范畴内便可获得唯一“真实的”理解。正如新左翼学者指出的那样,基于中国学研究范式展开的毛泽东研究,不仅意味着二者共享了“理论贫困”,而且意味着毛泽东研究不可避免地会生发于中国学的理论预设和理论关怀之上^[3](P15)。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定位毛泽东并明确拒斥“异端说”,构成了新左翼学者批判保守主义解读模式的主要发力点。如前所言,保守主义学者的学术传统及其出身限制,使得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脉络和毛泽东的具体实践经验出发勾画其思想肖像成为相关研究的固定化“路径依赖”,这种勾画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并无过多联系。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过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出场”,他更多的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实干家或经验主义者。例如,作为保守主义解读模式最重要代表性人物的施拉姆,始终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受传统文化因子的形塑,“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10](P98)。针对保守主义解读模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之外界划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研究范式,新左翼学者呈现出了最坚决的理论拒斥态度。他们普遍认为,界划毛泽东究竟是否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仅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漫画式图像”相对比,研究者首先需要真正理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方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认知和比对。而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保守主义学者在进行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时(他们通常通过二者的比较性研究来证明毛泽东的非马克思主义定位问题),他们自身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的局限不仅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度,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在评价

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时的评价标准和评价视角的选择问题^①。

第三,基于不同理论视角接续毛泽东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构成了新左翼学者批判性阅读的主要路径。从理论基础层面发出与保守主义解读模式针锋相对的批判声音之后,如何论证毛泽东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构成了新左翼学者批判性话语的核心主题。有学者首先明确界划了何谓马克思主义“正统”(orthodoxy)的逻辑界限,因为这是构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定位毛泽东的基础性问题。奈特以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为例,指出衡量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正统性程度,必须首先确立评价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标准,而所谓的正统实际上是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苏联1931-1936年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随着1938年《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中期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11]。这一点与奈特一贯的理论立场相一致。奈特坚决拒斥保守主义解读模式设定的必须从中国传统出发理解毛泽东、反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限制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他坚持认为,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保持着内在逻辑的基本连续性^[12]。还有学者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为例,批评了保守主义解读模式置于毛泽东头上的唯意志论者和马克思主义“异端”的“帽子”。保罗·哈里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保持着基本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主要体现在毛泽东仍然首先将阶级视为经济范畴,进而从意识与政治层面去理解阶级,最终仍然将阶级斗争的产生归因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13](P544-549)。此外,哈里还以毛泽东的关于社会形式和社会变化的思想为切入点,阐释了其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即“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典范”(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31](P117-145)。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复杂性理论判断的批判性透视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也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理论勾画问题。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主流学者坚持认为能够对毛泽东思想肖像做出单一勾画,并且将其构筑的毛泽东思想肖像视为一种绝对的排他性存在。而海外新左翼学者始终坚持认为,因为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毛泽东在当代世界中影响的持续性和开放性,很难获得一种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所谓唯一终极性存在,因而他们更多倾向于从历史和时代条件不断变化的维度出发,不断重构毛泽东思想肖像并使其展现出一种持久的开放性空间。

第一,毛泽东本人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多元可能性空间。毛泽东集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其诸多思想和实践因子很难从单一维度出发加以把握。此外,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构筑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社会和人民影响的深度广度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肩的。这其中包含着正确和失误等多重复杂因素的相互交织,很难用某种单一的词汇做出所谓的综合定性和评价。一方面需要深入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把握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更需要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超拔出来,从一个更加宽阔、深远的维度去把握其理论和实践可能具有的持久性价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左翼学者始终坚持认为,“不可能形成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实践的终极评价,只可能形成一种持续开放的竞争性解释,其通过多元且经常碰撞的方式构筑了毛泽东思想肖像”^[31](P15)。在新左翼学者看来,目前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正呈现出愈发封闭和单一的保守

^① 很明显,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外学者中国学研究的出身导致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精神的了解,对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并未获得清晰统一的认识,因而只能用一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漫画像”来对比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进而得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定论^[31](P8)。

主义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已经被逐渐接受为一种真理性常识,进而成为西方社会观察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主要形式。新左翼学者对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展开了最激烈的批判和抵制。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应当是一个能够得以持续不断追问的研究对象,不能寄希望以某种单一的方式来衡量毛泽东,这样做只能增加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理解的保守主义倾向^[3](P12)。

第二,历史和时代条件的深刻变动及其附加理论效应,决定了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立体性和多元性。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多面化存在,不仅是由毛泽东本人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性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变动性决定的。这种理论上的影响效应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一方面,当下实践的变动性和以往历史之间的差异性,催生了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复杂性。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方式与改革开放之后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时期主客观条件变化引起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及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因子似乎与当时的实际情况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这无疑增加了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理论难度。另一方面,现在观察者拥有的不同理论立场和现实诉求也催生了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差异性空间。在海外新左翼学者看来,毛泽东在当代中国已愈发超越了作为单一个体的人物存在,而是具备了某种象征性意义或一种符号性的存在。每个中国人都会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情感偏好来勾画不同的毛泽东思想肖像。毛泽东的思想正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进行着不同的运用,人们从毛泽东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同的信息并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方式^[3](P6)。正如尼克·奈特所言,毛泽东思想肖像犹如棱镜一般,每当棱镜的一面发生转动时,其折射出的光谱便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9](P3)。可见,海外新左翼学者坚决拒斥主流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单一化勾勒的研究模式,坚持认为对毛泽东的认识绝不可能获得某种单一的、排他性独断真理,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的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恰恰是毛泽东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也是当代毛泽东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所在。

第三,海外主流学者在毛泽东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保守主义弊病,阻碍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科学解读模式的生成。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早期大多数都是从海外汉学或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分化出来的。上述学科门类的研究十分强调文献资料的收集、考据和整理,这种研究范式经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传承,最终成为主导海外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主流话语。因此,在海外毛泽东研究主流学者那里,对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首要任务便是大量收集毛泽东的文本并进行翻译、加工和整理。他们认为,只要全面占有毛泽东的文献便能达到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无损式勾画。海外新左翼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批判,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幻象。在这种解读方法中,读者和文本从属于一种父权制的关系状态,读者完全从属于文本而不能发挥任何主观性作用,读者的理论前见等因素在经验主义阅读模式之下是不可能被考虑到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认为,“如果采取适当客观的精神来足够认真地审视可供使用的证据(即毛泽东的客观文本——引者注)的话,我们便可以达到一个至少是初步然而却是客观的阐释;当毛泽东的全部文本都能够公诸于世以及相关证据都可以获得的话,那么,将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最终判断”^[3](P6)。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新左翼学者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激烈批判,他们坚持从(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框架出发,立足于文本与作者复杂交互关系的基础,对文本的开放性空间和作者思想的多元勾画问题展开了集中阐释。在现代主义解释学理论看来,文本不可能自动呈现作者的写作意图,甚至在后现代主义解释学那里,文本不过是某种僵死性的存在,需要阅读者不断结合当下的情景加以激活,阅读更多的是一种当下的理论再生产过程。其实,文本的真正价值意义,只有在不断被解读中才能凸显,否则不过是一堆僵死性的符号堆砌物而已;或者更进一步而言,文本存在的价值意义就是等待被后世进行持续性解读,这是一种可能因后世主客观条件变迁而会产生出不同文本价值的持续性开放性空间。倘若以一种绝对化的排他性方法阅读毛泽东,那么这种经验主义阅读模式下构筑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只可能是单一的封闭性存在。

四、阅读毛泽东及其方法论反思

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新左翼学者对主流学者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路径和方法展开的批判,彰显了20世纪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两条不同研究模式的理论分野。尽管从整体上来说,新左翼学者对重构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批判性介入,仅仅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小众,但在很大程度上,其对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深度广度起到了不小的冲击作用。从今天的历史语境看待20世纪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冲突,特别是新左翼学者的批判性突围,可能会从如下方面对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突破,对深化毛泽东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长期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较为流行的是传统汉学研究方法,比较侧重文本的考据等工作,并坚持认为需要全面掌握毛泽东的全部文献以便可以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其实,在现代主义解释学看来,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前见之间存在着特定的间距,二者并不会自动融合,这是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毛泽东的真实写作情境单纯地依据文本的客观符号,很难得到直接的呈现,必须对文本进行再历史语境化的处理,即从文本生产时的真实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把握作者写作文本的理论意图。换言之,不能以真空化的方式将文本从丰富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而消解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之根。这一点对于毛泽东研究更是如此,因为毛泽东并非单纯的学问家,其文本绝非是对单纯抽象思辨理论问题的兴趣,而是基于现实实践需求、为求解现实实践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思考。习近平明确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4](P11)。海外毛泽东研究主流学者长期存在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直接将毛泽东研究规制为一种单纯文本的研究,这是对毛泽东本真思想的严重误读,同时也是新左翼学者批评主流学者相关研究长期存在“理论贫困”的主要原因。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主流学者对毛泽东文献的高度重视以及始终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学态度,是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必须做好的基本功。尽管新左翼学者代表人物尼克·奈特对自己导师施拉姆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展开了激烈批评,但是他也首先坦承,施拉姆留下的最宝贵经验就是强调毛泽东研究中文本的指导作用,相关理论阐释必须要始终置于对毛泽东文本的详细分析之上^[9](P7)。

另一方面,全新方法论与研究视域的批判性引介,不能排斥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历史研究范式的科学指导。海外新左翼学者高度重视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自省,特别强调引入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这一点对深化毛泽东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来说应当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全新方法论的引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批判性分析基础之上,特别是需要依赖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引。以海外新左翼学者尤为偏爱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为例,强调读者在阅读毛泽东文本过程中先在的理论前见可能对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有影响,这一点固然没有问题,但不能从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阅读的主体过分偏向读者,忽视作者思想的相对客观性,进而将阅读完全理解为无客观中立性标准的主观主义阐释的过程,这必然会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解读模式。换言之,在这种解读模式那里,毛泽东思想肖像就完全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进而成为一个供读者或解释者任意理解的对象。这一点在海外新左翼学者关于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理解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诸多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或实践,却在海外新左翼学者的扩张式解读中被理解为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象征性存在。应当说,这种解读模式催生的毛泽东思想肖像,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下描绘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新研究方法论的引介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基础上,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之下加以审视,必须侧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出发把握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 [1] 本杰明·I. 史华慈.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陈玮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2]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2).
- [3] Arif Dirlik, Paul Healy, Nick Knigh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 [4] 薛龙.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 路克利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 [5] Timothy Cheek.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6] 萧延中. 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第4卷(“传说”的传说).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8] 叶卫平. 西方“毛泽东学”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 [9] Nick Knight. *Rethinking Mao: 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 [10] 斯图尔特·R. 施拉姆. 毛泽东的思想. 田松年、杨德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尼克·奈特.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 张明译. 现代哲学, 2014, (5).
- [12] Nick Knight.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 [13] Paul Healy. Misreading Mao: On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08, 38(4).
- [14]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Overseas Scholars' Academic Speculations on the Portrayal Of Mao Zedong Thought

From the Debate on the Two Paths of Overseas Mao Zedong Research in the 1990s

Zhang Mi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ong-standing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 mode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Mao Zedong research hopes to obtain the exclusive truth about the portrayal of Mao Zedong Thoughts, the illusion of empiricism in reading methods, and the theoretical field of vision "dwarfing" caused by the researchers' adherence 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studies, which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the New Left scholars in the 1990s. Representatives of New Left scholars, such as Dirlik, Healy, and Knight, not only positioned Mao Zed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lineage and perceived Mao Zedong from multiple aspect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complex historical heritage, but also devoted themselves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empirical reading mode and introducing such hermeneutic methods as symptom read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ao Zedo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ove research pat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New Left scholars to have critical speculations on the portrayal of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as well as a valuabl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path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Mao Zedong research. However, thi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lso has unavoidable limit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calls for further analyses and speculations with a diale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ttitude.

Key words overseas Mao Zedong studies; Chinese studies; Marxism; New Left scholars

■ 收稿日期 2021-09-23

■ 作者简介 张明, 哲学博士,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苏南京 210093。

■ 责任编辑 涂文迁